

外部力量与译者主体性的建构*

——以《圣经》翻译为例

陈梅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随着翻译主体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译者主体性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视域。本文拟讨论在《圣经》翻译译者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各种外部力量是如何对其影响和控制的。目的是从外力影响的角度分析《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以期拓展和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关键词:外部力量;《圣经》译者;译者主体性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external factor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bl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external factors; *Bible* translator;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06)06-0050-03

1. 引言

传统理性主义的翻译观(rationalist translation)认为译者是决定翻译过程的唯一力量,翻译的行为是由其中心力量即译者所控制;而支配译者的唯一力量只能是原作者或原作;译者只能是原作的忠实奴仆;对原作的忠实性是衡量译作的最高标准。对翻译主体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主体的内部研究,而忽视了外力乃至外力演化而成的内力在译者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当今西方译界非常活跃且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 2001)对译者主体性研究较新颖地提出了其所谓的后理性主义翻译(postrationalist translation)理论,这种翻译理论是一种超越理性论译者主体性的观点(卢玉玲, 2004:56)。罗宾逊(2001)认为译者就是作者,译者根据自己的语言与所在的外部环境进行翻译。罗宾逊在强调译者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了外部力量将不同程度地影响译者的翻译。罗宾逊将这些外部力量解释为:1)译者应和原作者心灵相通,译者的这种能力可以通过神学家的身份来实现。2)译者必须听从思想意识所规范的原作者的精神。3)译者在解释原作的同时受到各种因素的控制。这些因素可以是语言的、历史的、政治的,也可以是来自译者内心的、世俗的、社会的。罗宾逊的后理性主义翻译观既承认前理性主义翻译(prerationalist translation),又赞成强调以译者为中心力量的理性主义翻译,同时还从认知及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明译者主体性的建构中,译本是译者潜意识斗争的结果。而这种斗争是译者本身以及作用于译者的各种外部力量的产物。

在提倡发挥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今天,外部力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彰显?本文力图不囿于传统的理性主义翻译观,借用罗宾逊的关于不同的外部力量对译者主体性影

响研究的成果来阐释作用于历史上几位著名的《圣经》译者的各种复杂的外部力量以及它们在《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选择《圣经》译者作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圣经》的翻译涉及从纪元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到今天的各种语言的译本,《圣经》翻译可以说是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译本最多,复译最频繁的翻译,正因为其在翻译史上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对其译者主体性建构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含义。而研究其外部力量在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影响可以从一个层面揭示《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

2. 几种不同的外部力量对《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影响

《圣经》的翻译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这是第一部由希腊语翻译《圣经》源语希伯来语的重要译著。来自不同的以色列部落的72名由当时的耶路撒冷主教选派的犹太神学者聚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他们两人一组分在36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翻译,结果译本却极为相似。最终被教徒们奉为经典译本,甚至取代了希伯来原本,成为后世许多语言翻译《圣经》的“原作”。

72名译者译文的惊人相似引起了古代一些《圣经》译者及《圣经》翻译理论家的重视。斐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转自谭载喜, 1991)认为神圣的《圣经》需要的译者也必须是神学家或虔诚的教徒。根据斐洛的观点,译者单凭通晓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不是神学者或虔诚的教徒是不能从事《圣经》翻译的。因此作为译者要想和原作者心灵相通,要想跨过语言、文化和时空的障碍,正确地译出原文,传达原作者的精神和意图,必须是神学家或虔诚的教徒。这种外部力量即便在人文主义思想统治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佐证。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和《圣经》翻译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赞成人文主义译者的语言方法翻译《圣经》的同时,强调这种方法不能解释

* 本文系重庆大学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梅(1972-),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05-09-15;2006-04-20(修改稿)

《圣经》的“精神实质”更不能吃透《圣经》的深刻含义。(Delisle, Jean & Judith Woodsworth, 1995: 48 - 50)

分析当时《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可以得出如下的解释:在当时译者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神学家或虔诚的教徒”这一定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译者所具备的能力或要求中,第一重要的是必须是神学家,其次是精通两门语言的。神学家说明译者具备翻译专门知识的才能。精通两门语言的说明译者具有翻译家最基本的技能要求。精通不同语言的神学家完全有能力主观地按照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去翻译,主动地、自主地去调动自己对文本的审美情感和意志,实现自己对文本意义的构建。但在这些译者的主体性建构中,翻译的目的、方法乃至氛围都制约着译者不能完全按自己的理解去翻译,不能按自己主观的随意性去遣词造句。而当时他们翻译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相信上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与《圣经》原作者达到“视界融合”,文本意义的构建才完整。这种外部力量的制约也可以理解为译者必须服从思想意识规范所规范的原作者的精神。这种外部力量在现在的翻译中也无处不在,只不过它通常被理解为译者对原作者的领悟与体味,是译者力图还原原作者的创作过程。

在罗马帝国时代《圣经》的翻译秉承罗马帝国征服的霸气,伴随着罗马帝国对古希腊文化的征服和掠夺,《圣经》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时期也被张扬得淋漓尽致。他们可以“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视为囚徒,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入自己的语言之中”。(Schulte, 1992: 12)

将这种由于帝国的征服而引起的文化的征服与被征服体现到《圣经》翻译中的代表人物首推哲罗姆(St. Jerome)。这位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且极具权威的神学家翻译了拉丁读者第一部标准的,后来又被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的《圣经》译本——《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在翻译中他强调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的风格;认为译者应当“靠征服把原文意思译成自己的语言”;译作必须与原作竞争(转自谭载喜, 1991: 31 - 32)。正是因为帝国征服的概念深入到译者潜意识,其翻译实践乃至其倡导的翻译理论才深深地打上帝国征服的烙印。虽然这种帝国的征服在漫长的《圣经》翻译史上为数不多,但这种《圣经》翻译理论突破了原作,包括至高无上的《圣经》在内的原作的绝对统治地位,《圣经》译者也开始关注自我的解释和表达。其中包括苏格兰著名《圣经》翻译家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在他对翻译的三原则的表述中,他提倡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原作的精神与风格。(谭载喜, 1991: 162 - 163)

帝国征服的外部力量也在漫长的翻译史上不断地演化和更新。这种译者主体性中最活跃的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张扬在当代的翻译理论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它的生命力。早已跳出了仅局限对原作文本与译作文本之间的研究的当代翻译理论意识到确立译者身份的重要意义,它承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如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重写,所有的重写都反映了译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诗学层面的选择(Lefevere, 1992: 1 - 3)。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1990)更把翻译看作是译者摆布文本的过程。

读者的接受这种外部力量对《圣经》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传播了人文主义思想。而“以人为本”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对《圣经》翻译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圣经》翻译的人文主义译者强调译者翻译《圣经》的语言自由。

当时人文主义译者的代表人物伊拉斯谟(Erasmus)认为人们在语言知识和学问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对《圣经》的新的理解(谭载喜, 1991: 77)。而这一时期随着民族语言和宗教改革的盛行,基于译入语的需要,《圣经》译者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译出适合本民族语言的译本,同时又引入外来语的语言结构以丰富自己的目的语,来满足读者的接受。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和《圣经》翻译家。路德翻译《圣经》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在翻译时追溯到完全未经后人篡改过的《圣经》原本,先从希腊语译出《新约》,后来又从希伯来语译出《旧约》,其译文是由一种由他确定下来并通用起来的“标准”德语版本。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路德遵循通俗、易懂、为民众读者所接受的翻译原则。因此路德的《圣经》译本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路德版的《圣经》译本不仅对德国民众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标准的、统一的德语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主张译者必须采用民众的语言。当时由教会统治着《圣经》翻译,不允许异教徒的译本存在,同时也攻击新的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但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在民族语言和宗教改革的强大压力下,《圣经》译者不得不考虑为民众服务的翻译。读者的接受在《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当时《圣经》译者已意识到翻译的交际功能,如果没有接受者,翻译也没有它存在的可能。因此翻译的一切,从翻译标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到翻译的全过程都应该有读者接受的参与。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经院神学家们翻译的译本晦涩难懂,从宗教普及的意义上说,考虑到广大的信教徒对宗教的需求,《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内涵中读者的接受成了当时首要考虑的构成因素。

在确立读者接受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的过程中,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经》翻译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它的价值。英国人文主义《圣经》译者、新教派的先锋廷代尔认为随着《圣经》读者的增多和阅读层面的多样化,《圣经》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谭载喜, 1991: 100)。可见廷代尔在翻译的过程中涉及到对读者领域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根据读者的需求、读者的类型和读者的阅读特点来确立自己的《圣经》翻译风格。这种廷代尔独有的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的《圣经》译文风格也影响到后世的《圣经》乃至世俗文学文本的翻译。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的文学翻译理论强调要从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的角度来审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确立,符合文学翻译接受者的特殊需求正是文学翻译者整个翻译活动所应达到的目标。

3. 结语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对原作的翻译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能动地改造原作、控制原作,使原作为译者主体服务的特性,但译者主体性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然受到原作、原作者和其他外部力量的控制,即客体的制约性。客体的制约性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都是译者主体性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作为译者主体性的两个重要的构成,其相互间的关系是译者只有在尊重客体制约性的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客体的制约性中必然包括各种复杂的外部制约力量和影响因素,这些原本作为外部力量的制约因素常常以内化的形式成为客体制约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故而成为译者主体性的基本构成内涵,也成为译者主体研究乃至翻译主体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论及的只是影响《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其中几种外部力量,在《圣经》译者主体性的建构中除了这几种外部力量肯定还会涉及到其他的影响因素。以上只是对《圣经》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初步认识,希望随着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深入,《圣经》译者主体性研究也会有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usan & Lefever, And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90.

[2] Delisle, Jean, & Judith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

[3]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4] Robinson, Douglas. *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5] Schulte; Rainer & Biguenet, John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2.

[6] 卢玉玲. 翻译的幽灵——评道格拉斯·罗宾逊的《谁在翻译?——超越理性论译者的主体性》[J]. 中国翻译, 2004(2).

[7]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第二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评选章程

一、总则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决定举办第二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评选,以记录和表彰过去三年来中国英语教学科研成果,推动未来中国英语教学科研的发展。

二、论文评选范围

由中国籍作者撰写的2003年7月-2006年6月期间(以见刊书日期为准)在国内外杂志、论文集中正式发表的有关英语教学中、英文稿件。

三、论文提交程序

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报名表/推荐信”,由所在学校(院校)负责人推荐并盖章,连同5份论文复印件(含目录页)一并寄给各分区联系人。每篇收取参评费50元,作为专家评审会议开支。分区负责人召集专家审阅,每个大区选出5-10篇优秀论文,报研究会秘书处,由胡文仲会长召集专家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若干名。由于实行匿名评审制,请作者删去正文中出现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等信息。

四、时间安排

论文提交日期截止到2006年9月30日(已当地邮戳日期为准)。请在信封上注明“优秀论文评选”字样。评奖结果2007年5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宣布。获奖论文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结集出版。

五、分区及稿件和参评费寄送地址:

1. 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负责人:赵忠德副会长

地址:116002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94号大连外国语学院科研处杨慧老师、孙英老师电话:0411-82803121 转 6211 传真:0411-82593683 电邮:dwkeyanchu@163.com

2. 西北地区(陕西、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负责人:杨达复副会长

地址:710128 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南路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张安伟 老师 电话:029-85319364, 029-85319435

3. 西南地区(贵州、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西藏)负责人:石坚副会长

地址:610064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陈爱莉 老师 电话:028-85412023

4. 中南地区(广东、海南、河南、湖南、湖北)负责人:陈建平副会长

地址:510420 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办 朱惊萍 老师 电话:020-36207003

5. 华东地区南片(上海、浙江、江西、福建)负责人:史志康副会长

地址:200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 通用外语考试办公室 刘焱 老师

电话:021-65311900-3234 电邮:hansyanliu@yahoo.com.cn

6. 华东地区北片(江苏、安徽、山东)负责人:王守仁副会长

210093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陈新仁老师

电话:(025)51983822(小灵通) (025)83594213(办) 电邮:cxr3354182@163.com

7. 华北地区(不含北京)(内蒙、山西、河北、天津)负责人:胡家岱副会长

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英语系 索亚莉 老师 电话:010-62751580 传真:62752469 电邮:english@pku.edu.cn

8. 北京地区:负责人:胡文仲会长

地址:10008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等英语教育事业部 刘相东 老师 电话:010-88819582

9. 台湾省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暂不参评。